

# 汉代丝绸之路文化生成与传播的历史镜像

姜国峰

河南工程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郑州 451191

**摘要:** 汉代丝绸之路开辟于张骞首通西域,形成于张骞二次出使西域,发展于班超再通西域。丝绸之路上以官方交流为核心的政治文化互动、以商品贸易为核心的物质文化互动、以多元艺术形式为核心的思想文化互动、以科学技术为核心的技术文化互动,对世界历史进程尤其是东西方文明之间的交流互动产生了巨大作用。汉代丝绸之路文化生成依托于“凿空之旅”的战略需求、广泛的商贸技术往来和多元传文弘道之路。尽管丝绸之路曾经的辉煌已经成为历史,但在丝绸之路上的广泛文化互动所演绎出的历史画卷、传承的文化基因,为文化生成与传播提供了最好的历史遵循和具有现代意义的历史经验,即良好的外部形象是汉代丝绸之路文化传播的客观表达,发达的经济技术是汉代丝绸之路文化传播的现实基础,持久的道统传承是汉代丝绸之路文化传播的依托载体。

**关键词:** 丝绸之路文化;文化生成;文化互动;文化传播

**中图分类号:** G125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2186/2023.02.012

**文章编号:** 2096-9864(2023)02-0091-08

丝绸之路是古代贯通中西方的主要商路,也是中国与西方世界经济、政治、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sup>[1]</sup>。自汉代丝绸之路开辟以来,其就承载着商贸往来、文化交流互动等功能,增强了中华文化在沿线国家的影响,增加了他们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为汉代文化的生成奠定了坚实基础。当前,国内外学界围绕古代丝绸之路展开了多维度研究,已有研究表明,学界侧重从某单一学科视角研究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互动问题,主要论及丝绸之路上的经贸、外交或人员往来<sup>[2]</sup>,关于汉代丝绸之路文化如何生成等问题的研究尚不多见。鉴于此,本文拟剖析汉代丝绸之路文化生成的历史逻辑,总结提炼具有现实性启发的经验和做法,以期实现“丝绸之路”

历史与现实的再次对话,实现中华文化的“返本开新”。

## 一、汉代丝绸之路的生成背景

自张骞首次出使西域以来,丝绸之路逐渐成为古代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从形成、发展到衰落经历了长期的演变过程,保留或延续至今的各类遗产形成一条无与伦比的文化线路,具有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为中华文化的广泛传播奠定了坚实基础。

### 1. 丝绸之路开辟于张骞首通西域,实现了文化传播的初步推广

西汉武帝时期,国家经济实力得到了提升,梦想彻底解决匈奴人长期侵入汉代边疆的难

收稿日期:2022-10-28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9BKS128);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研究重大项目(2021-JCZD-09);河南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2021年度重点课题(2021JKZD14)

作者简介:姜国峰(1980—),男,黑龙江省勃利县人,河南工程学院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华文化传播。

题。公元前139年,汉武帝欲联合曾被匈奴人赶走的大月氏攻击敌人,张骞应诏而去。张骞带着圣命从长安出发,一路经甘肃的陇西、兰州,再经过河西走廊出玉门关而到达楼兰古国。遗憾的是,张骞并没有完成寻求军事联合的使命。不过,张骞出使西域多年,带回来了许多中原没有的物种,扩大了中国人的地理视野,激发了汉武帝打开通往西方世界的极大兴趣。

## 2. 丝绸之路形成于张骞二次出使西域,推动了文化传播的载体生成

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决定再次联合西域诸国以彻底击溃匈奴,遂第二次派遣熟悉西域的张骞前往。这一次,张骞携牛羊万头和数千万金帛前往,目的是与乌孙、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大秦(罗马帝国东部)等西域腹地各国结盟、开展友好外交活动,以此拓展汉代的外交空间。为了加强与西域各国的联络,朝廷在河西设置了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个驿站,实施沿途管辖,从地缘政治上建立了汉朝与西域诸国紧密联系的渠道,即著名的陆上丝绸之路。虽然丝绸之路的开辟是出于政治愿景,但无意间打通了横贯欧亚非大陆的通道,促进了欧亚非大陆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使之呈现出一派繁荣向上的景象,为不同国家、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互通奠定了基础。

## 3. 丝绸之路发展于班超再通西域,拓展了文化传播的多元形式

到了东汉时期,国家实力进一步增强,吸引西域诸国归附汉朝,永平十六年(73年)汉明帝派遣班超出使西域。班超沿着张骞开辟的北线地理路线,出玉门关达楼兰后兵分两路,一路向北从北疆的渠犂、龟兹、姑墨、喀什再到大夏、粟特、安息等地,就是今天的阿富汗、乌兹别克斯坦、伊朗等;另一路经南疆取道鄯善,经且末、精绝、于阗、疏勒越帕米尔高原到大宛等地,形成了一个“丫”字形的基本干道,丝绸之路的南线

被顺利开通,地理疆界得以进一步拓展<sup>[3]</sup>。西汉时汉武帝在轮台和渠犂设立了使者校尉,用来管理西域的屯田事务,开创了在西域设置官吏的先河。公元前60年又设立西域都护府,揭开了在巴尔喀什湖以南地区正式设置行政机构的序幕。此后,班超又在西域镇守三十年,使得龟兹、姑墨、温宿、匈奴、大宛等西域诸国归附于东汉,鄯善、于阗、疏勒三个王国也恢复了与汉朝的友好关系。总之,班超通过征战拓展了张骞开辟的丝绸之路的地理范围,维护了国家安全,进一步畅通了东汉通往西方的丝绸之路,极大地提升了国家影响力。

## 二、汉代丝绸之路文化传播的多向互动

丝绸之路作为人类互动的鲜活例证,对世界历史进程尤其是东西方文明之间的交流互动产生了巨大作用。丝绸之路上的互动主要涉及外交、商业、艺术和科技等,形成了独特的商贸文化、风土人情文化、物种文化、农耕文化、工业文化、宗教文化等,不断促进着多种族多文化的融合发展<sup>[4]</sup>。因此,分析汉代丝绸之路文化传播的多向互动,应着重于官方交流、商品贸易、多元艺术形式和科学技术四个方面。

### 1. 以官方交流为核心的政治文化互动

张骞出使西域后,西汉对西域诸国的认知逐渐清晰,如“天子既闻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土著,颇与中国同业,而兵弱,贵汉财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属,兵强,可以赂遗设利朝也”<sup>[5]</sup>,提升了西汉与西域诸国交流往来的信心。在此背景下,汉朝廷也不断加深对西域各国的认识,开始围绕西域风土人情、政治经济、人物事件等著书立说,突破了原有的地理界限,拓展了观察世界的视野,提升了汉朝在丝绸之路上的影响力和辐射力,最终促使汉王朝成为西域诸国朝贺纳贡的“天朝”。在朝

贺纳贡的过程中,有无数“相望于道”的使者,在这条古道上开展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等全方位的往来,极大地促进了沿线各国的密切联系,这与汉武帝扩大外交空间的意愿高度契合。汉代对外战略中还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派遣宗室公主与丝绸之路上大国君主的和亲政策。汉代君主往往会赏赐和亲国乘舆服饰、御用物资,甚至还有陪嫁的宦官、侍御、工匠、语言翻译等,不断加深和亲国对汉朝的了解和认识<sup>[6]</sup>。应该说,汉代丝绸之路的开辟,极大地促进了沿线各国的政治互动,增进了政治文化的交流,成为各国互相认知的重要窗口与途径。

## 2. 以商品贸易为核心的物质文化互动

陆上丝绸之路开辟后,无数的商人和商队在这条遥远漫长的古道上奔波,我国的丝绸、茶叶、瓷器等并不是直接运往销售地,而是经过西域的安息进行集中转销,最后换回欧洲人、阿拉伯人的马匹、谷物、水果等。其中,“丝绸”是这条路上最耀眼的物品。商人运用纺织技术将获得的丝绸变成丝纱,如此一来就降低了丝绸本身的成本,也能织出更薄的丝织品被各国贵族们竞相使用,作为身份地位的象征。当时,丝绸交易已经被炒作成全民参与的集体行动,甚至连守卫边疆的士兵都参与其中。据史料记载,“吞远燧卒夏收 XX 自言债代胡燧长张赦之买收缣一丈,直钱三百六十”<sup>[7]</sup>。为了牟取暴利,中外商人乐于通过陆路长途贩运丝绸,从而促进了中国丝绸持续不断地销往海外各国。

当然,商品交易使得诸多中国元素融入西域诸国,同时也为我们带来了中原没有的植物物种和珍禽异兽等,对生产生活都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例如,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时将中亚一带的葡萄、曹荷、安石榴、黄蓝、苜蓿、蚕豆等带了回来,改变了中原的原有植物样态和饮食习惯;各种香料、乐器、大批珍禽异兽等通过引进或朝贡的方式进入中原本土,不断改变

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丰富了人们的精神需求;可以在恶劣环境下作战的马匹,以及御寒的貂皮毛毡等传入中原本土,进一步提升了军队的作战能力。

## 3. 以多元艺术形式为核心的思想文化互动

丝绸之路的开辟,使得国内先进的思想、瓷器和服饰文化等开始向外传播,并给周边国家文化的生成发展带来一定的影响。儒家思想的传播使得儒教文化圈开始形成。这说明儒家思想不仅对中华文明,而且对世界文化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此外,以瓷器为载体的陶瓷文化在中国有很长的发展历史,但瓷器由于本身比较脆弱、不便陆运,在欧洲极其昂贵,成为上层人物的奢侈品。丝绸之路为西方带去了中国瓷器所承载的精巧、细腻、华丽等纤细入微的艺术情调,催生了崛起于法国的“洛可可风格”,成为洛可可艺术风格和古代中国文化契合的代表<sup>[8]</sup>。与此同时,西域的各种乐器、佛教、歌舞传入中国后,不断丰富着中原大地的精神文化生活,特别是佛教在中国本土开花结果足以说明思想文化传播的深远影响。佛教自西汉哀帝时经丝绸之路传入天山以南与河西走廊一带,最后传入中原,隋唐时期达到鼎盛。当时的西域与河西地区高僧辈出,他们沿丝绸之路前往天竺取经、讲学,带回印度佛经,而天竺僧人也纷纷赴汉朝交流、讲学,促进了佛教在东亚的传播与发展。同时,修寺凿窟成风,随处可见的石窟、造像、壁画上有关佛教的艺术作品,以及地中海区域的毯路纹流行于中国本土,都是中西文化交流的艺术结晶<sup>[9]</sup>。敦煌、云冈、龙门、麦积山等石窟所表现的佛教艺术都有外来文化艺术的风格,促使中原文化发生变化,促进中西文化融合,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精神层面更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sup>[10]</sup>。丝绸之路的开通,还给中原大地带来了西域的各种乐器,如曲项琵琶、五弦琵琶等,以及各种乐曲、舞蹈等诸多艺术元

素。由此可见,丝绸之路不仅使中原地区对其他国家和民族产生了深远影响,也推动着自身文化艺术的不断发展创新。

#### 4. 以科学技术为核心的技术文化互动

在欧洲近代工业革命之前,我国古代的四大大发明、炼铁术等技术,成为推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革的重要因素<sup>[11]</sup>。张骞出使西域后,将中国先进的养蚕种桑、冶铁技术、水利灌溉技术、造纸术等一路传播,助推沿线各国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汉代的蚕桑法通过丝绸之路传入西域于阗国,西域的丝织业逐渐发展,出现了西域“胡锦”。后来,蚕桑技术又传入拜占庭和波斯,促使了当地丝织业的出现和发展。而各国生产花样各异的“胡锦”作为贸易物品四处流传,促使了中国生产的丝织品在西方的广泛畅销,也带动了丝绸之路沿线各国丝织技术的不断改进,提高了丝织业的生产效率<sup>[12]</sup>。中国冶铁技术传入西方以后,帮助其生产出各种农用机械,辅以水利灌溉技术,提高了沿途各国的农业生产率,有力地促进了当地灌溉农业的发展。农业灌溉技术水平的提升又极大地提高了当地的农作物产量,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手工业的发展,刺激了西方商品经济的产生和发展<sup>[13]</sup>。另外,中国的造纸术对西方文明的进步也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4世纪初到18世纪末,经粟特人传到中亚又传至非洲和欧洲各国的造纸术被各国广泛使用,推动了阿拉伯科学文化和欧洲文化的传播,尤其促进了《古兰经》《圣经》等的大量书写和印刷,使伊斯兰文明和欧洲文明以超乎任何其他宗教的传播速度和效率走向世界<sup>[14]</sup>。可以说,随着丝绸之路传至西方世界的中国技术发明,对印度、阿拉伯等国家产生了深远影响,为欧洲文艺复兴和资本主义的产生提供了重要条件。

### 三、汉代丝绸之路文化生成的依托载体

不断调整的外交政策、东西方货物的广泛

交换,以及两汉乐府和汉代哲学等,奠定了盛世大汉的文化生成基础,佐证了这个历史王朝的辉煌,对改变世界格局亦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汉代丝绸之路文化传播与互动的四种类型基础上,提炼出汉代文化生成的依托载体,对汉代丝绸之路文化生成的机理和结果进行深入研究,有利于总结对现代文化生成具有启发意义的历史经验。

#### 1. “凿空之旅”的战略需求拓展了汉代丝绸之路文化生成的外交空间

自西汉开始,中原人从西来胡商和戎狄骑兵那里得知,西边有广阔无际的草原、雪山和戈壁,他们把玉门关、阳关以西的地带统称“西域”。而汉初匈奴屡屡入犯塞内,对黄河中游农耕区造成破坏,甚至出现威逼长安的危局,这迫使汉代的统治者们开始寻求击败匈奴之术<sup>[15]</sup>。于是,汉代君主们或为了军事联合,或为了经济利益而不断调整内外政策,走上了一条军事联合—休养生息—军事进攻的外交之路,最终成功凿开了通往西域的大通道,并不断扩大传播盛世汉代文化的新空间。最初,汉武帝即位后起用王恢,引诱匈奴进入马邑,欲一举歼灭,但最终功败垂成。从汉高祖刘邦到文景时期汉朝采取“与民休息”的安内政策,外交方面多以和亲政策为主。“汉初,天下初定,士卒疲于征战,刘邦采用娄敬建议,以汉代宗室女嫁给匈奴单于为阏氏,岁送一定量的絮、缿、酒、食等给匈奴,双方约为兄弟,开放关市,两族人民互通贸易。”<sup>[16]</sup>后来的惠帝、吕后、文帝、景帝和汉武帝初年都延续了和亲政策,这为汉代在休养生息期间专心发展经济、缓和军事压力创造了条件。到了汉武帝时期,经济实力的强大使其外交政策开始转为武力征服,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开始对匈奴实施“征讨政策”,但最终失败。从元狩四年(前119年)开始,汉武帝对匈奴再度实行和亲的安抚政策,继续恢复发展经

济。经过汉初 70 余年的休养生息,汉代经济社会获得了很大发展,军事力量也逐渐强大起来。于是,汉武帝废弃和亲政策,而集中力量对匈奴进行军事打击,汉匈关系开始发生新的转变<sup>[17]</sup>。此后汉军与匈奴多次交战,最终将匈奴赶至远离汉区的沙漠边缘,以至“漠南无王庭”,双方也由此进入了数十年僵持状态。当然,在汉匈对峙过程中,汉代君主逐渐增强了抵御匈奴进犯的决心,外交空间进一步突破至华夏诸侯、列国之外的地区。总之,汉代不间断地开疆拓土,以及日渐凸显的综合国力,都使匈奴、西域诸国对汉文化的态度从敌视、对抗到仰慕,从隔膜陌生到亲近,汉代文化沿着丝绸之路一路向西传播,其辐射力和影响力不断提高,在融入其他文化样式的过程中传递着自身的核心价值理念,影响着其他文化,又成就了“凿空”西域的丰功伟业,为汉代丝绸之路文化生成与传播拓展了外交空间。

## 2. 广泛的商贸技术往来巩固了汉代丝绸之路文化生成的基础

张骞等人出使西域,虽以军事为目的,但客观上推动了亚欧大陆商道的畅达。然若深论之,这条中西通道的开辟,商业效果和技术交流已经远远大于军事或外交目的。丝绸之路作为一条商贸技术交流的通道,促使各国进行了广泛的商贸和技术互动,给汉朝带来了大量资金财富,也为西方社会送去了意想不到的收获。尤其是丝绸、贵重瓷器等一度成为西方上流社会追捧的奢侈品,改变着人们的审美和品位。中原的丝绸由于色彩绚丽、质料柔滑、穿着舒适,在西域被认为是最上等的衣料,因而逐渐风靡域外诸国,同时也换回了西域特有的马匹、毛皮、珠宝、玻璃器皿等商品。从中国出口的金银、镜子甚至鸟类等也令西方大开眼界,一并传播出去的还有纺织技术、农田水利灌溉技术、造纸印刷技术和养蚕种桑技术,让沿线国家见识

到了汉朝的繁荣昌盛和先进技术,使得他们都愿意和汉朝进行贸易技术往来。与此同时,为了吸引外商来华贸易,创造安全的营商环境,汉王朝对来华外商实行超国民待遇,坚决打击各种恃强凌弱、强买强卖的行为,保护商人合法权益“欲诣洛者,为封过;欲以郡还者,官为平取,辄以府见物与共交市,使吏民护送道路,由是民夷翕然称其德惠”,营造了公平有序的贸易环境<sup>[18]</sup>。总之,丝绸之路上的各国在频繁商贸技术往来中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跨国贸易,汉代强大的行政和法律手段保护了商贸技术往来的合法有序,各种形式的往来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昌盛。如此,中国先进技术的传入对欧洲各国的科学技术、宗教信仰、政治文明、思想文化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很大程度上奠定了西方现代文明的基础,也使得汉代开始以更加开放的心态接受世界、走向世界,汉代丝绸之路文化生成的内生基础不断强化。

## 3. 多元传文弘道之路丰富了汉代丝绸之路文化生成的内涵样式

两汉文化传承发展了传统礼乐文化,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封建文化,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乃至世界文化发展史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汉代丝绸之路的形成发展过程中,有无数文艺形式相互激荡,生成了让人印象深刻的文学景观,丰富了各国的物质文化生活与精神文化生活,为汉代文化生成注入了更为丰富的元素。从这个意义上说,丝绸之路又是一条传文弘道之路<sup>[19]</sup>。具体说来,在音乐文化方面,两汉乐府民歌开始随着丝绸之路传至西域各国,为或粗犷豪放或端庄持重的西域音乐增添了温婉柔情、悲惨凄美的多样元素。在文学创作方面,汉代随着国力日渐强盛、人口不断增多,思想文化的传播表现出强烈的天下情怀。例如,“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为“赋家之心,包括宇宙,总揽人物”

的代表,成为沿线各国纷纷借鉴的思想巨著<sup>[20]</sup>。至于儒教,儒生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系统地提出了“天人感应”“大一统”学说和“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的主张,导致“周道兴东”,更是为西域各国集权稳定社会政治和经济做出了一定的贡献<sup>[20]</sup>。在民族精神方面,张骞出使西域时所表现出的不畏艰险、永不放弃、效忠国家的精神,使人们看到了一个民族的文化教化力和穿透力,给西方人带去了震撼和敬佩,一些西方人开始被中国所吸引,他们著书立说、介绍中国,其中最著名的当数马可·波罗历尽艰难险阻而写下的《马可·波罗行纪》,全面介绍了被儒家思想浸润的富裕的中国,让整个西方为之疯狂和神往。总之,不同文化形式的互动与交流,直接促进了多种文化形式的相互交融碰撞,不断丰富着汉代丝绸之路文化生成的内涵样式。

#### 四、汉代丝绸之路文化传播的历史镜像

汉代丝绸之路文化的传播不是单向性输出,也不是被动地输入,而是基于充分生成所形成的具有特定历史时期特征与痕迹的文化样式,站在现代角度再现汉代文化的经历,不仅仅在于追忆历史,更可从历史的脉络中找到现代文化生成的传统依据。汉代文化不是单一的民族文化,是处于中原大地的各民族优秀文化精髓的集合体,具有更为开放的包容胸怀和丰富的内涵体系,以及强大的应变性和适应性<sup>[21]</sup>。先进的汉代文化以强大的吸引力、影响力、凝聚力和感召力,得到了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认同,对当代中华文化生成亦具有深远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 1. 良好的外部形象是汉代丝绸之路文化传播的客观表达

丝绸之路的开通,大大拓展了汉代外交对

象和外交空间,外交地理空间从华夏地区延伸至四方远国,为构筑汉代文化生成的强大自信和树立国家良好的外部形象创造了良好条件。丝绸、金银、镜子等都是西方所稀缺的物资,令人大开眼界,让西方人认为汉朝是一个物产极其丰富的国家,强国形象逐渐树立,丝绸之路沿线各国都愿意和汉朝进行贸易往来,也促进了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往来。同时,凭借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汉代的文化思想、经济模式、政治制度开始沿着古丝绸之路蔓延传播,为沿线国家带去了新的思想、艺术形式,以及生产生活中的新方法、新现象,在悄无声息改变其他国家和民族的过程中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尊重、向往和好感。例如,丝绸之路沿线诸国的贵族开始使用汉字,甚至起了汉语的名字,如春君、丞德等<sup>[22]</sup>。同时,有些贵族开始学习汉语和汉文化,甚至还会用汉语书写有西域色彩的内容,以表达对汉朝的忠心,充分彰显了汉文化的强大吸引力。随着汉朝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外交空间的拓展,对外形象也越来越好,汉朝的政治体制、经济模式、文化思想和科技成果得以更广泛地传播,进一步增强了这一时期丝绸之路文化传播的自信,为整个人类的发展和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

##### 2. 发达的经济技术是汉代丝绸之路文化传播的现实基础

从历史上看,丝绸之路兴盛之时大都是古代中国最强盛之时,特别是丝绸之路开辟的两汉时期我国经济发展领先于世界。以古都长安为例,来自中亚、西亚、南亚、东南亚以及欧洲等地的各国商人随处可见,奇珍异宝令人眼花缭乱,铁行、笔行、肉行、绢行、秤行、大衣行等一应俱全,旅店、饭店等服务行业兴盛,俨然一座国际性大都市,显示综合国力之强盛,故而有“中国是一个居天下中心的礼仪之邦”之美誉,强大经济实力建构起来的国家形象越来越好<sup>[23]</sup>。

这种强大的经济实力是通过诸多方面体现出来的。例如,铁器与牛耕普遍使用,水利设施大量兴修,使得汉代农业生产技术世界一流;冶铁、铸铜、煮盐、纺织和漆器业兴起,使得汉代在诸多领域的技术水平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官铸五铢钱的通用,使得人类社会商品交换方式由物易物转化为物币交换,推动着世界货币体系的改革。汉朝通过一系列的经济制度、科学技术等率先实现诸多领域的突破,在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开始鹤立鸡群,引领全世界走向新的变革,增强了西域诸国追随汉朝的信心和决心。在此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国家逐渐认可汉朝“丝绸之路”的战略模式,渴望与汉朝建立联系,夯实了汉朝构建“东北亚大陆”秩序的基础,也使得汉朝文化更便利直接地传播至沿线国家<sup>[24]</sup>。由此可见,这一时期汉朝借助自身强大的经济实力推动了各国经济与文明的发展,奠定了文化传播的基础,也为促使中华文化展现更加开放包容的胸怀和生成姿态提供了新范例。

### 3. 持久的道统传承是汉代丝绸之路文化传播的依托载体

通过丝绸之路的绵长时空线路,中国、印度、埃及、波斯、阿拉伯、希腊、罗马等各种古老文明联结起来、交融起来,各种不同的文化思想不分高低优劣,相互尊重、相互学习、深入交流,对沿线各国经济社会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为文化多样性交流提供了新的载体,成为不同民族、不同文明相互融合发展的重要纽带。汉代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华文明的延续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为世界文明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例如,儒学思想被西域各国君主视为治国理政和管理臣民的法宝;文学创作为丰富丝绸之路沿线各国民众创造力和想象力,创新写作手法,提供了新的启迪;汉代复杂的宫廷礼仪纷纷被沿线各国奉为效仿的范式。总之,汉代丝绸之路文化传播不

仅仅体现在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传播上,还在于通过道统传承促使汉文化走向世界,更在于丝绸之路沿线各国与汉朝建立联系后,开始在中华文化大体系下不断发展,逐渐形成了精彩纷呈的多种文化样态,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中华文化与其他文化和谐共生的包容性愈加凸显。

## 五、结语

尽管丝绸之路曾经的辉煌已经成为历史,但在丝绸之路上的广泛文化互动所演绎出的历史画卷、传承的文化基因,为文化生成与传播提供了最好的历史遵循和具有现代意义的历史经验。为此,应将经济发展作为与不同民族深度融合的基础,尤其是促进丝绸之路沿线不同民族的思想观念、生产生活方式、宗教信仰、精神文化活动的相互交融,这对于坚持中华文化生成与多元文化的深度融合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应将高度的民族自我认同作为文化生成的现实依据;应将提升文化传播力作为文化生成的重要手段,以丝绸之路题材纪录片的形式,围绕空间建构一整套叙事体系和话语体系,借助可视化地图,真实再现沿线景观和民俗风情,形成尊重彼此的文明样态,不断满足现代社会人们渴望了解“丝绸之路”的愿望和文化想象。可以说,“一带一路”倡议为沿线各国寻求共同的文化记忆,畅通因历史原因而中断的文明交流提供了新的契机,对于进一步提升中华文化在丝绸之路沿线的吸引力、辐射力和美誉度,彰显中华文化生成具有重要意义。

### 参考文献:

- [1] 韩永辉,邹建华.“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国与西亚国家贸易合作现状和前景展望[J]. 国际贸易,2014(8):21.
- [2] 伊斯拉姆.从丝绸之路到“一带一路”:重塑过去,影响未来[M]. 柏林:德国施普林格出版社,2019:17.

- [3] 张春海. 探究楼兰道的具体路线和历史地位[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8-04-20(02).
- [4] 来永红. 丝绸之路的文化内涵及其当代价值探析[J]. 丝绸之路, 2016(24): 10.
- [5]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123.
- [6] 范晔. 后汉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9: 97.
- [7] 冯卓慧. 汉代民事经济法律制度研究: 汉简、律令、文献所见[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4: 134-135.
- [8] 陈伟. 谈中国文化对西方的影响[EB/OL]. (2013-08-01)[2022-10-01]. <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3/0801/c40531-22402943.html>.
- [9] 杨雪, 刘瑜. 从毳路纹管窥丝绸之路中外纺织服饰文化交流[J]. 丝绸, 2019(9): 1.
- [10] 冯文博. 丝绸之路图案艺术的演变研究[J]. 西北民族论丛, 2019(1): 218.
- [11] 孙玉琴. 汉唐时期丝绸之路贸易的历史经验及其现实启示[J]. 国际贸易, 2014(8): 16.
- [12] 朱国祥. 从梵语借词看“丝绸之路”印度文化对回鹘文化的影响[J]. 贵州民族研究, 2019(8): 165.
- [13] 张德芳. 汉帝国在政治军事上对丝绸之路交通体系的支撑[J]. 甘肃社会科学, 2015(2): 17.
- [14] 陈霞. 丝绸之路的开通及其对新疆历史的影响[J]. 西域研究, 2013(3): 10.
- [15] 福柯. 知识考古学[M]. 谢强, 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98: 77.
- [16] 冯天瑜. 开辟“丝绸之路”的三大动力源[J]. 湖北社会科学, 2014(9): 107.
- [17] 王健. “近代丝绸之路”: 从“丝绸之路”到“一带一路”历史跨越的重要节点[J]. 南京社会科学, 2017(3): 144.
- [18] 陈寿. 三国志[M]. 北京: 中华书局出版社, 2000: 133.
- [19] 林梅村. 《郑芝龙航海图》考: 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藏《雪尔登中国地图》名实辩[J]. 文物, 2013(9): 64.
- [20] 高荣. “商性”相通: 汉唐间河西走廊与丝绸之路贸易[J]. 历史教学(上半月刊), 2016(10): 6.
- [21] 张清俐. 考古揭示丝绸之路文化交流价值[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2-10-28(02).
- [22] 石云涛. 汉代丝绸之路的开拓与中外交流途径[J]. 人文丛刊, 2016(9): 293.
- [23] 姜国峰. 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的价值、困境与路径[J].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4): 119.
- [24] 许正. 汉代“丝绸之路”战略与“东北亚大陆”秩序的塑造[J]. 学术界, 2015(11): 31.

[责任编辑: 毛丽娜]



引用格式: 姜国峰. 汉代丝绸之路文化生成与传播的历史镜像[J]. 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24(2): 91-98.